

山东大学：涓滴细流汇成中法友谊江海

山宣

2023年6月,山东大学考古队在法国波尔多大学的联合考古中,于法国南部的一处洞穴遗址中发现古人类指骨化石。这项联合考古,是中法建交以来第一个中法旧石器时代考古合作项目。对于增进两国人民了解、亚欧大陆东西两侧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山东大学厚植齐鲁文化沃土,深受儒家文化滋养,生来就肩负着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崇高使命。山东大学与法国高等学府的深度合作,为推动中法文化交流增添了新鲜血液。

开联合考古之先河
近年来,山东大学与法国高校在探究人类起源这一全人类共同关心的考古问题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2016年,在山东大学李占扬教授的建议下,山大与波尔多大学开启了中法联合考古发掘项目,由山东大学法籍教授鲁可(Luc Doyon)担任该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2019年,两校考古专家组成联合考古队,首次启动法国旧石器时代岩层遗址考古发掘,为探索早期人类起源、现代人起源作出积极贡献,也在我国考古历史上,开创了与中国在欧洲合作开展考古项目的先河。

新冠疫情期间,鲁可教授克服诸多困难,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为联合考古发掘做了积极的准备工作。在他的带领下,联合考古队在试掘中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化石和距今5万-2万年的古人类石器,取得初步成果。随即,法国政府批准了2023年-2025年在法国西部图尔托拉克(Tourtourac)洞穴遗址的发掘。

2023年3月,山大与波尔多大学签署两校合作备忘录。同年5月,联合考古队赴法国西部多姆雷省雷河支流流域的图尔托拉克洞穴开展发掘项目。该遗址发现于1873年,曾发现过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石器和尼安德特人骨化石,是一处包含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和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物的洞穴遗址。

这次洞穴考古虽然发掘面积有限,但由于洞穴堆积复杂,为了保证出土遗物时空单位的可靠性,队员们在发掘过程中都十分谨慎。很多时候,他们都没有使用考古常用的发掘工具手铲,而是改用小的刮刀慢慢地从胶结且遍布岩块的洞穴堆积中提取宝贵的文化遗物。经过一番“慢工出细活”,联合考古队共掘出古人类化石、石器、动物化石和艺术品4000余件。截至目前,已出土人类化石、石器、动物化石和艺术品2万余件。在比较重要的发现中,除前面提到的尼人指骨化石外,还有2022年出土的、距今现代人指骨1件,人类牙齿化石1枚等。

助力中法民心相通
中法两国都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山东大学本着开放办学的历史基因,充分发挥文史学科优势,广泛搭建致力于促进中法民心相通的沟通平台。经过一番“慢工出细活”,联合考古队共掘出古人类化石、石器、动物化石和艺术品4000余件。截至目前,已出土人类化石、石器、动物化石和艺术品2万余件。在比较重要的发现中,除前面提到的尼人指骨化石外,还有2022年出土的、距今现代人指骨1件,人类牙齿化石1枚等。

2006年,山东大学与巴黎法法联盟总部合作建立山东大学法法联盟,积极开展法法语言培训、法语水平测试等教学活动,同时举办以推介法国语言文化为目的、面向公众开放的文化交流活动,在促进中法两国文化和中法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8年10月,由法国布列塔尼大区议会、雷恩市及周边地区议会合作建立的法国布列塔尼孔子学院正式揭牌运行。多年来,布列塔尼孔子学院以“文化孔院”为特色,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影响广泛的文化活动,其中,以“中国文化周”为主题的春节系列活动已成为孔院乃至整个法国西部地区的品牌文化项目,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支持和欢迎。活动通过组织舞龙舞狮、“美食街”、展览、讲座、音乐会等多种形式,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加深了中法两国民众的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在当地的影响。

2022年9月,当时还是大二的我,荣幸地通过二次选拔,踏入尼山学堂这片古典学术的沃土。学堂以经典原文疏读作为基本的课程脉络,把培养古典学术人才作为办学目标。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刚进入学堂的我们得以参与到《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项目中。《永乐大典》和尼山学堂一起,迎接了我这个古典学术世界的见习旅行者。这部细密的黄皮大书,成了我对“古籍”的第一印象。白宣纸红线条,墨得发亮的绢筒体,就算完全不懂的人,也能从精良的装帧和典雅的审美中最本能地觉察到,它是绝世的珍品。



以中法文化交流年、巴黎奥运会为契机,山东大学鼓励广大师生积极参与双向互动,助力中法人文交流,促进两国民心相通。今年5月20日,为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在雷恩市政府、济南市政府、中国驻法国使馆、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共同支持下,山东大学派出专业团队赴法,与布列塔尼孔子学院和雷恩-济南友好协会共同举办“中国花园”揭幕。“中国花园”的建设和启用,是雷恩-济南友好关系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孔子学院多年来推动完成的一项中华文化传播和中法友好交流的重大项目。今年7月,山东大学还将有2名志愿者为奥运会志愿者赴法国巴黎参与志愿服务工作。

推动中法文明互鉴
山东大学以特色优势学科为载体,积极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深入开展中国在欧洲的文明交流对话和超越文明互鉴、推动中法文明交流互鉴。

中法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清康熙年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白晋(Joachim Bouvet)等人来华交流中西文化,大量中国典籍西传至法国。1860年后,我国大量文物流失海外。后来,那振铎、王重民等西渡欧洲,访求遗落的珍稀汉籍,发现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圆明园四十景图》《皇清职贡图》等皆为圆明园皇家旧藏。

2014年,山东大学牵头承担“全球汉学合璧工程”国家重大文化项目,与法国国家图书馆签订合作意向,汉籍回归之路正式拉开序幕。

2016年2月,山大派学者赴法国国家图书馆开展汉籍编目、回归前期工作。法国国家图书馆派出多名工作人员协助。此项工作引起法国学界的高度关注,山东大学校友也积极响应、出谋划策。经过8个月的努力,这项工作顺利完成。

其间,山大得知法国国家图书馆还藏有一部分汉籍,由法国探险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清末来华购买并带回的敦煌研究资料。经查阅,他们发现这部分汉籍含有大量的珍稀版本,有进一步整理和研究的必要,于是向法国国家图书馆提出了重新整理的请求。而图书馆为了这部分汉籍没有机读目录,急需中国学者帮助完成。

几经周折,2020年项目启动,却赶上疫情最严重之时,赵雨婷、姚楚青等10余位在法国留学生做好防护措施后,进馆查阅古籍。2023年,山大陈恒新、曹淑娟等老师先后赴法。在师生们的不懈努力下,2023年12月,山东大学与法国国家图书馆正式达成伯希和专藏中文古籍复制印刷回归合作意向。

截至目前,山东大学在法古籍编目和整理工作取得了系列成果:2021年9月,出版《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古恒部分)》;2021年12月,出版《欧洲地区所藏中国珍稀文献丛刊》,收录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汉籍8部;完成编写《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古籍目录》等多部目录;研究著作《法国国家图书馆汉籍研究》等也将出版。

对法交流源远流长
山东大学与法国高校的合作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1995年,山东大学与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巴黎第七大学,简称“巴黎七”)签订国际合作协议,在生命科学、数学、汉学等领域开展师生交流和联合培养,培育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
在1997年法国率先同我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4年同我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大背景下,山东



2016年3月11日,山东法语联盟在山东大学圣昆伦音乐厅举办音乐会。图为山大学子与乐队成员合影

大学同包括巴黎六大、七大、九大在内的第一批法国高校逐渐建立起高质量深度合作网络,着力吸收法国高校的先进办学理念、优秀教育资源,为助推山东大学“双一流”建设、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国际教育合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开放发展,是山东大学的建校战略。2002年,基于山东省与法国布列塔尼大区自1985年缔结的友好省关系,济南市与该大区省会雷恩市结为姊妹城市。为促进中法友好关系进一步深入,山东大学立足服务山东教育高地建设,先后与该大区的多所高校开展了学生培养、联合科研等方面合作。

2005年前后,山东大学对法教育合作与交流网络基本构成,与近10所法国高校正式建立校级合作关系,与法国高校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成为山东大学对欧合作交流的亮点。

进入新时代,山东大学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开放办学新举措,对法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与法国近20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开展了实质性合作。携手法国高校,共同建设凸显山大优势学科特色的平台,扎实推进全方位、深层次、实质性的对法战略合作,在数学、汉学、经济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国际人才培养能力显著增强,科研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教育合作再添新篇
通过与法国近20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开展实质性合作,山东大学系统引进法国的优质教育资源,搭建包括短期交流项目、学期交换项目、奖学金项目、联合培养项目等在内的宽口径国际化人才培养渠道,有力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和质量,培养富有“山大基因”、堪当民族复兴重任、具备全球胜任力的时代新人。

助力中法友好交流,以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务实举措推进对法交流合作新时代新篇章,是山东大学服务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应有之义。今年正值中法建交60周年,山东大学将紧扣中法外交战略方向,携手法国高等教育机构,创新合作模式,全方位机制化开展教育交流,共同谱写中法友好新篇章,为推动中法关系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贡献智慧和力量。

新时代新征程,山东大学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在“两个大局”中积极稳妥作为,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和区域发展需要,重点关注中法科技前沿、国家间经贸往来和人员流动新动向,加强与全球伙伴的交流互鉴互通,增强办学实力,提升办学质量,构建中法合作交流新模式,在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中展现山大应有的新作为。
(本文原载于《神州学人》2024年第6期)

我的思政微课教学心得

韩巧霞

五年前的我,尽管对思政微课并不陌生,但对如何上好一门思政微课,心里仍有很多忐忑。从《形势与政策》到《道德与法治》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虽然课程内容并不相同,但是都让我深刻体会到,思政微课教师只有用自己真正理解了、掌握了、弄通了的理论去教育学生,才能让青年学生真懂真信、入脑入心。

于是借助每一次学院组织的专题教学,我不断充实自己的教学储备,从青春赛到思政微课教学比赛,我努力提升自己的教学技能。当看到许多同行老师为上好一门思政微课作出的各种辛苦努力,我深受感动和鼓励,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在教学过程中如何细心、耐心、用心设计课程的每一个细节。

思政微课的教学要充分了解学生所思、所关注的,我积极关注大学生在大学阶段尤其是低年段阶段面临的发展问题和困惑,及时回应,突出教材知识点与学生关注点的融合,以问题为导向开展教学结合点,并设计每节课的教学专题,聚焦学生关注的问题,寻找学生的困惑、兴趣点,把思政课的理论和学生的生活需求结合起来,把课堂的所讲和学生的所思衔接起来,增强与学生的共鸣点。

同时,作为思政教师要善于从中国故事中寻找教学资源,特别是要搜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和科技强国建设中的鲜活事例,并将其转化为课堂教学案例,把蕴藏其中的生动实践与深刻精神作为教学内容的重点滋养,在不断学习引导学生对现实的情感共鸣中增强其对思政理论的认同。以威海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国核示范电站新能源科技馆等为载体,我挖掘威海地域特色的红色资源,融入课堂中,讲好科学家故事,讲好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故事。

思政微课不仅仅停留在教室,要把学生带出“小课堂,走进”大课堂。我通过项目化任务,鼓励学生主动在课堂之外探索相关内容。指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并完成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方面的调查实践。在这些实践活动中,思政课上讲的内容变得可观、可感、可行。在所指导的学生团队中,有的获评全国大学生学术科技竞赛竞赛国家特等奖,有的获评全国大学生专业志愿者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优秀团队,有的在“调研中国”项目中获全国百强团队……学生的收获和成长,让我深受鼓舞,社会实践是思政微课的一门好教材。也是在一次次沉浸式体验中,我与学生共同努力上好“行走的大思政课”。
(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副教授)

与《永乐大典》共赴一场历史之旅

年励励

作为参与项目工作的本科生,我们承担的工作总体上只有两项:“拆分《永乐大典》”“各归其书”。杜泽逊老师对整个《永乐大典》工作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像拆房子,拆的过程中知道当年是怎么融合起来的,把拆出来的砖、瓦、木头分类。”《永乐大典》是一部巨大的类书,以韵为纲,以字隶事,每一单字下分类汇集各种资料,以引书的方式呈现。而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赋予每一个项目下的每一本引书一个专属于它的“身份证”编号,以保证无论后续工作如何拆分整合,都能随时将其归位,以防混淆。在编号的基础上,以具体的书为单位,将《永乐大典》编卷过程中被拆散融合的每一本新书重新拆开,使其从大典的架构中脱离出来。原本以“册”为单位的《永乐大典》残卷,变成了以“条目”为单位,化整为零。之后,又以“书”为单位进行重新整合,达到“分书重编”的工作目标。很多《永乐大典》编卷中的巧思与妙处,非“拆”不能体味。

“解解”《永乐大典》的过程常能使我获得对历史最直观的感受。在时间长河中,自己的印

迹,他们或许曾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又或许只是“无名之辈”的自白。今天的我们或许只能从目录或引用里窥其光华,更多的古籍,甚至难考其真。在剪贴的过程中,我在《永乐大典》里遇到了一个人,他说他叫曹恩,生卒年及事迹无考,《曹恩集》也未见书目著录。《永乐大典》残卷中所收录的四首词,或许是在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名字的最后一点点足迹。这只是我随便碰上的“有缘人”,还有更多更多,他们或许是僧尼,或许是医生,或许只是无名小吏。《永乐大典》留下了他们最后的生活的气息,哪怕只是只言片语。

随手抓起一本《永乐大典》,常会在首页上看到各国图书馆的藏书图章,看到英文书写的题记。在这套精美绝伦的黄皮大书上,偶能遇见水渍、火痕、虫咬,有时候兴大起,想找手里这册《永乐大典》的上一册看看,结果,似乎是注定的失望。偶然意识到,《永乐大典》现存不足4成。我常在项目工作的间隙,看着手边的黄皮大书放空自己,放飞思绪的想象。像在空中,和她在架梁下沉思,在四库馆抄书官笔下低语;也会在雨夜,在陶渊明的熊熊大火里,或在荷花池里窒息。或许她会哭泣?我不觉得她会哭泣。她被赋予了最高贵的出身,最较好的容貌,受尽了歌颂与赞美。她裹挟历史,阅尽人间,她应该早已看破了兴衰沉浮。五千年文明的厚重,给了她雍容的

气度,给了她笑看沧海桑田的底气。但是,我们会为她哭泣,因为她实在美好。

“这字儿太漂亮了”,这常是人们对《永乐大典》的第一句赞美。“三位字全是由人手抄,都是标准的绢筒体。”看起来只是轻轻一笔,背后藏着的是,无数人的焚香继晷。剪贴过程中偶尔会在不经意间留意到字体的风格换了,刚刚那个抄书官貌似比较谨慎,这一位要更严谨些。当然这样的感觉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并不多见,绝大多数时候,它们在我眼里,间距均等、风格一致、整齐划一。只有翻开那册《永乐大典》的最后一页,看见“书写员臣某某,圈点生员臣某某”时,他们才有了姓名,他们的字也好像有了灵魂,知道名字之后再回过头看,仿佛能看见字体的缝隙里,看到他墨笔、笔烧的灯。他们或许是“无名之辈”,但他们的灵魂却在《永乐大典》,与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一同不朽。我们仿佛可以透过墨迹,看到千禧之后兢兢业业的身影,他们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普通而丰满的心。

今天的我们,不也和他们一样身处历史里吗?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我们有幸在尼山学堂学习古典学术,有幸以本科生的身份参与到国家项目,更要把手里的经典读明白、继承好,更要用细致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对待《永乐大典》整理。中华灿烂文明不只是藏在真实可见的典籍,更藏在人与文化载体互动中的理解与感受里。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尼山学堂2021级本科生)